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

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

GOD, GULLI

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 克劳德·罗森 © 著

· 王松林 等 ©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

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克劳德·罗森 © 著

王松林 张 陟 徐 燕 葛春萍 ©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 / (美)罗森著；王松林等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ISBN 978 - 7 - 5446 - 2837 - 2

I. ①上…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欧洲文学评论 - 1492~1945 IV. ①I50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0493号

Claude Rawson 2001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

图字：09-2011-296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许进兴

印 刷：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8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500册

书 号：ISBN 978-7-5446-2837-2 / I · 0216

定 价：60.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顾 问：陈众议 玛乔瑞·帕洛夫 庄智象

主 编：聂珍钊

副主编：王松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仁

史惠风

吴 笛

陆建德

陈 红

陈建华

罗良功

胡亚敏

胡全生

隋 刚

曾繁仁

蒋洪新

谢 群

编委会名单

总序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9位院士的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所选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尤其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学术成果做了重点译介。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界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思想著作，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相比，对外国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专论的译介还有待加强。这套丛书产生的初衷，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弥补。本丛书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一些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不同，在这些出色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的边界不仅没有消失，文学本身不是正在死去，而是以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生，充满了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永恒魅力。我们从这套丛书中还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负责任的批评家不能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去曲解文学、误导读者甚至去毁灭文学，而应该通过批评与阐释，探索文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从中得到教诲。这一点对于我国文学批评中盛行的文学经典的戏说和大话倾向，其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编者期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设有所启示，进而推动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组织每年都要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的院士。在230余年的历史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公共管理等各领域一共选举产生了4000多位美国院士和600多位外籍院士，其中包括2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00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目前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含语文学学者)且仍然健在的院士仅有169人，他们均是当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文化理论及批评方面的顶级专家，其学术思想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和文化批评界都有着重大影响。

20世纪堪称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建国以来，国内出版界组织力量翻译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经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意义重

大。这两套丛书的选材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文学理论，几乎囊括了国外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引入中国，如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还有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等。这些批评是我国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批评方法，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造就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可以说，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极大地开阔了我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在一阵阵理论热浪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文学批评偏离了对文学的批评。有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某些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命题自恋(proposition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哲学或美学命题的求证，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被解构了、被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己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自我演绎。文学的意义没有了，自然文学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的消失导致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消亡。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利奥塔、拉康、赛义德等人的理论的误读或消化不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还没有为中国学者提供充分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范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了9部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译介给读者，试图展示当前美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热”之后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学术洞见之上的另一幅批评图景。

自20世纪90年代起，盛行于美国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在美国学界遭受冷遇。对于美国大学英语系名目繁多的理论课程，赛义德十分不满，将其称为“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2006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时任主席、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也针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的泛文化批评乱象告诫同行们说，大学的文学批评教授们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参见威廉·崔斯：“英文系的衰退”，《美国学者》2009年秋季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斯科尔斯也将大学英文专业的衰落归咎于理论的过度膨胀。在不少专家看来，那些花样翻新的时髦理论消弭了文学的人文价值，抽空了文学的道德情感内涵。美国国内的这一反“理论热”现象很快引起了我国文学研究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并引发了对“理论热”之后的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热烈讨论。例如，本世纪初我国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讨论，就是在理论热之后对文学理

论与批评的深度反思。我们认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文本。只要脱离了文学，不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批评根本就无法存在。只要脱离了文学文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只能陷于空谈，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反对“不读而论”的概念推理式研究，推崇富有情感交流的、有个人洞见的对文本的解读式批评，主张批评者要担当起文学批评的伦理责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此次翻译的这套文学批评丛书，就是为了给国内学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译丛选取的9部专著，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可以说体现了当今美国批评家的创造性思想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其中有3部关于诗歌的专论。《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站在美国当代诗歌的最前沿，用最敏锐的眼光审视媒介时代的诗歌创作，高擎智慧的火炬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学术天地。她用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引导着当代诗歌学术研究的发展，评论家称她是一位“阅读精确、拒绝将艺术的评判权拱手交给教师或理论家”的作者。《语言派诗学》的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他是当今美国“语言诗派”的代表诗人和理论家。他从意识形态和审美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美国诗歌特征，尤其是他对语言诗的语言、声音、形式与意义以及政治策略的研究，是我们认识和解读语言诗的一部指南。《诗与感觉的命运》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斯图尔特教授。她是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批评家和教育家，帕洛夫教授、伯恩斯坦教授分别称其为当今“国际最顶级学者”之一和“本世纪文学批评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援引上至古希腊下至后现代的诗歌经典，论述了诗歌与人类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内在联系，从艺术审美的高度探究了诗歌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原来的选题计划中，我们还选择了美国圣母大学吉拉尔德·布伦斯的《诗歌的材料：诗学理论概要》一书准备译介给国内学界。该书对当今美国先锋派诗歌的写作实践做了哲学层面的解读，认为诗歌的意义隐藏在诗的创作和阅读的空间之中，主张读者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回到诗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场去寻找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未能获得这本书的版权，我们无法将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戏剧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著名莎学专家、前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主席大卫·贝文顿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贝文顿教授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莎士比亚专家之一，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他把莎士比亚一生分为七个阶段，对莎士比亚的历史背景、个人生平、戏剧创作及舞台表演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驾轻就熟，思路清晰，说理透彻，成就了这部研究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

在小说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3部著作。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的《上帝、格利佛与种族灭绝》从文学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考究，批判了近五百年来欧洲对所谓异邦“野蛮人”的“他者”文化想象，涉及的作家有斯威夫特、蒙田、王尔德、萧伯纳等，视野开阔，见解独特，启示深刻。霍普金斯大学埃里克·桑德奎斯特教授的专著《福克纳：破裂之屋》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主题、结构及其与南方神话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福克纳不能不读的著作。爱荷华大学盖勒特·斯图尔特的著作《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从文体学与叙事学的

角度，就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笔下强大的语言力量的表述与情节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方法独特，注重文本细读，是近年来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文化批评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戴尔班科教授的《撒旦之死：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一书，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部美国精神传记”。作者对美国过去和现代之间的道德传统的割裂，特别是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及精神信仰的匮乏进行了批判，作者也因此而被《时代杂志》评为2001年度“美国最佳社会评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让-米歇尔·拉巴泰教授的《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将现代主义文学纳入1913年这一特殊的年代，详细考察了1913年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文学艺术现象和政治事件，如非西方作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战爆发前最后的世界和平、叶芝和庞德的合作等，从全球文化思想变化及交融的角度审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端，视角独特，见解深刻。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学研究空前繁荣，出版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但我们只能从中挑选部分杰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上译介的著作，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同行们在文学研究方面有其突出的优点：方法多样，务实求新，细致深入，特色鲜明。这些专著均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借得认真阅读和参考。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中国读者的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译丛选择的著述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不易阅读、理解和翻译，因此对于译者而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各位译者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把这些学术著作翻译得完美，但是由于水平有限，仍然无法达到目标，在此请各位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总编 聂珍钊

谢辞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即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借此机会首先向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先生表示衷心感谢。陈众议先生长期关注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关心中外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关心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这套丛书的选题、论证和整个翻译工作，都倾注了他的热情和关心。他的珍贵友谊、热情鼓励、宝贵建议，是我们完成此项工作的动力。还要衷心感谢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是这套译丛的顾问，为我们初选的著作提供了实事求是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评价，为我们联系每个作者和协商版权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能及时地热情地帮助我们。可以说，这套译丛得以面世，陈众议先生和玛乔瑞·帕洛夫教授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

我们还要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他们是：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斯图尔特、大卫·贝文顿、克劳德·罗森、埃里克·桑德奎斯特、盖勒特·斯图尔特、安德鲁·戴尔班科、让-米歇尔·拉巴泰。我们不仅要感谢他们同意我们翻译他们的著作并在中国出版，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感谢他们随时解答译者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相信，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国的学者和读者都将大受裨益。我们还要感谢这套译丛的美国出版社，是它们的充分合作和授权，才使这套译丛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还要感谢庄智象教授、副编审孙静女士，以及所有著作的责任编辑。庄智象教授既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也是这套译丛的顾问。这套译丛从选题、翻译到出版，与他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套译丛也是他特别倾心的一个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一生要做几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个项目正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孙静女士是出版社这套译丛的具体负责人，她不断对译丛的翻译工作提出具体指导和帮助，这套译丛倾注了她的大量心血。每部著作的责任编辑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每部译著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审校，提出十分重要的意见，消除其中的疏忽与瑕疵。我们还要感谢刘华初先生，他负责这套丛书的版权谈判。是他辛苦和有效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还要感谢负责这套译丛的装帧设计的美编，因为是他的精心设计才最终使这套译丛的出版变得完美。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参与这项工作和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离开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来自各方面的帮助，要完成这样一项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心存感激。

译者序

2012年5月9日，笔者有幸与本书作者克劳德·罗森在武昌桂子山上相会。他是应邀以教育部海外名师的身份前来中国讲学的。初见罗森教授，只见他一脸和蔼可亲的样子，略显富态的身体，行走时腿脚有些不便，需借助手杖。我很难将《格列佛、上帝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的作者与眼前这位步履蹒跚但却精神矍铄的老者联系起来。不过，片刻交谈之后，我马上被他的学识所折服。翻译过程中脑海里不时浮现的那位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者的影子渐渐变得清晰，与这位谈吐风趣、目光犀利的学者完全对接起来。深入交谈后得知，罗森教授与中国有缘，原来他就出生在上海，父亲曾在长沙工作过。得知他的专著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他非常高兴。

罗森是耶鲁大学梅纳德·麦克英文讲席教授(Maynard Mack Professor of English)，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尤对菲尔丁和斯威夫特有深入研究，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亨利·菲尔丁及重压下的奥古斯都时期的理想》(1972, 1991)、《格列佛与温雅的读者》(1972, 1991)、《剑桥文学批评史·卷4：18世纪》(与 H. B. 尼斯贝特合著，1997)、《文学与斯威夫特时代的政治》(2010)。他是《剑桥文学批评史》(*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和《布莱克威尔系列评传》(*Blackwell Critical Biographies*)的总编，兼任包括《现代语言评论》在内的多家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辑，曾任英国18世纪研究会主席。罗森还写有大量评论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文学副刊》、《纽约时代书评》及《伦敦图书评论》上，他在当今英语文学批评界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称罗森是当今学界“最具鉴赏力的、最敏锐的18世纪研究专家之一”(参见《伦敦图书评论》，2001年8月23日)。近年来，克劳德·罗森多次应邀在中国著名高校讲学。

《格列佛、上帝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2001)是罗森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力作。此书视野开阔，奇思迭出，观点新颖。乍看书名，似乎很难将封面的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因为根据普通读者对《格列佛游记》及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一般了解，种族灭绝与自命不凡的格列佛医生抑或是愤世嫉俗的斯威夫特应该关系不大，而仁慈的上帝与种族灭绝更不应该有任何瓜葛，且不说格列佛或斯威夫特与上帝之间在种族杀戮上存在什么内在的关联。然而，这部著作却巧妙地游走在虚构、历史与想象的边缘，依据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大量的旅行及探险文献资料，从文学人类学批评的角度切入，将格列佛、上帝与种族灭绝三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置于“野蛮与欧洲想象”这一框架中，围绕斯威夫特和蒙田之间的关系、爱尔兰人与印第安人类似的悲惨命运、法西斯主义与二战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等问题展开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作者探幽入微，寻踪探秘，自1492年哥伦布的“发现”之旅一路追至1945年二战结束。通观全书，罗森渊博的知识面和深邃的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格列佛、上帝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是一部奇书，是一部从一句话出发演绎而成的辉煌巨著。这句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漫不经心的一句口头禅。当我们对某人怀恨在心或气愤之极时，免不了会狠狠地诅咒此人“应该枪毙”或者“从地面上消灭”。对于人们何以会在语言修辞层面上发出这番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咒语，我们少有人会去做严肃的追本溯源式的思考。大多数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表述只不过是人们一气之下放出的狠话，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从肉体上消灭此人。可是，克劳德·罗森却敏感地意识到了这句话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隐喻。他以敏锐犀利的目光，追寻它的语文学和文化人类学渊源，对大量的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挖掘出这一语言表述所遮蔽的实际暴行。罗森指出，自从上帝声称要用洪水把人类“从地面上消灭”起，种族灭绝意识便潜伏在人的邪恶意识深处。在罗森看来，这句口头禅的内涵令人难于琢磨，但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可以是“说着当真”，也可以是“说说而已”，还可以是“不只是说说”。全书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内容涵盖了从《圣经》创世纪到现今的欧洲文学和非虚构作品对他者的想象和书写，时间跨度穿越了从欧洲对美洲的征服一直到二战结束近600年的历史。罗森发现，在小说和“说说而已”之间，在语言和历史上的暴行之间有着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他对斯威夫特、蒙田、萧伯纳、王尔德等作家笔下有关野蛮和杀戮的书写进行了精细的比较和分析，征引珀切斯、哈克鲁特、德勃莱、哥伦布、韦斯普奇、布干维尔、库克等诸多旅行作家和人种志史家的记述，透过浅层的言语修辞来窥视暴力行为的实施过程，试图撩开欧洲他者文化想象的面纱。

本书关注的是野蛮人这一“他者”概念在欧洲人想象中引起的共鸣，讨论的是欧洲人如何面对或处置他们想象中的杀戮对象，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印第安人以及被征服的土著人、异教徒，甚至还有巫师、妓女和穷人。罗森对于欧洲人之于“野蛮人”的态度有精彩的论述：

“野蛮人”令我们心神不宁。他们属于“非我”，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或者“任何语言”，我们鄙视他们，惧怕他们，侵略他们并杀戮他们；我们又同情他们或羡慕他们并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性趣；我们向往他们的天真和活力，他们对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行为和衣着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但其实我们比他们更野蛮；他们相貌酷似我们，这令我们心神不宁，想入非非。（参见本书作者前言）

这里的“我们”可能主要是指代表了西方“良心”的知识精英和批评家们，或者说，“我们”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就是“欧洲人”的感受。这段关于“我们”和“他者”的论述自然令人想到罗森很可能是一个后殖民批评家。可是，如果读者对他做这番臆测，那就错了。罗森虽然在论述中借用了后殖民批评常用的术语，但他并不想读者将他看成是斯皮瓦克式的批评家，他并不赞同后殖民批评家将斯威夫特攻击为“恶魔般的恐外症患者或厌世者”。然而，奇怪的是，他同样也不赞同批评家们将斯威夫特完全塑造成了一个正义事业的支持者或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反对殖民、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民主斗士。

他希望以某种方式“使斯威夫特从那些自以为是的后殖民批评家们愤愤不平的长篇抨击中解脱出来”，他甚至认为很多评论家都做了件“与斯威夫特相反的、不相干的事情”（参见本书导论）。罗森在书中专辟一章，题为“杀掉穷人：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主题？”，对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做了颠覆性的解读，试图推翻传统批评家有关此文是对英国残酷殖民统治的抨击这一共识。罗森认为，斯威夫特在这本小册子中讥讽地暗示饥饿的穷人应该杀掉自己的孩子，烹煮孩子的肉以填饱肚子，这一“建议”实则更多地流露出了作者盛怒之下对爱尔兰人的诋毁，即暗示了传说中爱尔兰人确有食人的残酷习性（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一“消灭穷人”的想法不仅限于斯威夫特，另外两位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和萧伯纳也难脱干系。前者对于社会改良者试图通过“让穷人活着的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极力讽刺；后者则干脆声称他厌恶穷人，急切希望灭绝穷人（参见本书第三章）。对此，罗森一一给予揭露，眼光不可不谓犀利。

罗森对斯威夫特的研究可谓与众不同，他眼中的斯威夫特是个“令人捉摸不定、情感更易爆发的人，一个具有深深的权利主义思想的人，一个勇于在人类思想奔腾不羁的勃勃生机中深入探索的人，同时他对人类思想保持批判和试图驾驭的姿态”（参见本书导论）。罗森的这番评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对大量的文本和文献资料的缜密分析得来，尤其是他对斯威夫特和蒙田的作品了如指掌，而书中引述的一百多部文献令人信服地支撑了他的结论。

然而，在洋洋洒洒的论述中我们发现，罗森并不轻易下结论。但是，在丰富的资料比照和精细的文本分析中，读者不难发现他思想的锋芒。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罗森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批评家，也不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他的观点常常发人之未发，令人耳目一新。譬如，在对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格列佛游记》以及蒙田的《论马车》、《论食人部落》、《论节制》等作品做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分析后，罗森指出蒙田和斯威夫特虽然反对殖民掠夺和杀戮行为，但是他们两人都曾认真地思考过大规模杀戮这一念头，他们那种乐意接受大屠杀并对之无动于衷的心态令人不安。又如，在本书第三章有关萧伯纳和王尔德的评论中，罗森再发奇论，颠覆传统上人们对这两位爱尔兰大师的看法，指出萧伯纳和王尔德骨子里均有“灭绝穷人”的想法，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难怪《泰晤士文学副刊》用“爆破”这一字眼来形容罗森这本专著的大胆创新，文章认为罗森最骄人的天赋就在于他“一直以来就对18世纪研究的种种盛行论调给予爆破，此书对斯威夫特及其他相关作家的研究尤显大胆新颖，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研究的爆破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森的著作通篇没有晦涩难懂的新潮理论或术语，所有的结论均来自对文本的精细分析并佐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论证，这种扎实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值得国内学界同行借鉴。

“野蛮与欧洲想象”是本书的副标题，也是罗森此书的出发点。罗森从斯威夫特对“耶胡”形象的模式化处理着手，指出“耶胡”身上汇集了欧洲人想象中“野蛮人”的所有外形特征：厚嘴唇、塌鼻子等，而这些特征被用来不恰当地形容爱尔兰人、犹太人和黑人。在比较与辨析中罗森指出，相对于斯威夫特的题材，蒙田探讨的话题视野要开阔得多，他更多是从人种史学的角度对种族的多样性进行考量，试图从个体文化差异中寻找出人类的共性。罗森对蒙田有独到的理解，指出蒙田是一个对“我们”与“野蛮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痛

苦探索”的思想家。这一“痛苦探索”的传统在欧洲文学中得以延续，也影响到了斯威夫特。确实如此，以英国文学为例，从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到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再到戈尔丁的《蝇王》，无一不在暗示那个“野蛮的他者”原来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借用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中马洛的说法）。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在开明的知识分子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外人”或“他者”，只存在将他人视作“外人”的态度或方式。对于保守者而言，“外人”即“他者”；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者”这一概念是错误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他者”就是我们自己（参见特里·伊格尔顿：“一点儿牢牢的管制”，《伦敦图书评论》，2001年8月23日）。

阅读罗森的这部著作对于读者来说可谓是一种挑战，因为作者涉猎范围之广令人望尘莫及，思维跳跃之敏捷令人目不暇接。罗森总是把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和蒙田的作品信手拈来，相互阐发，并大量旁及鲜为人知的史料或非虚构素材，若是读者对斯威夫特和蒙田知之甚少，又缺乏必要的知识背景，阅读此书就往往会不得要领。譬如，在讨论欧洲人眼中的野蛮形象时，罗森指出斯威夫特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描写乌托邦的，而蒙田在对理想社会的划分上则要相对显得宽泛或宽容的多（参见原著第44—45页）。如此这般的论述比比皆是，要求读者对两位作者及相关史料有相当的了解。此外，罗森的论述的大胆新奇之处也需要读者细细琢磨方能深谙其中奥秘。例如，书中有关野蛮、食人及活人剥皮的论述，对霍屯督妇女悬垂的乳房与钱袋和富足所做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将欲火中烧的那位年轻的母耶胡形象与斯威夫特的女友范妮莎所做的比较与生平考据，还有将慧骃国的阉割政策与纳粹德国为优化人种强行他人实施的绝育行径进行的类比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表现出罗森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学术眼光。罗森在虚构文本和历史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出入自由，显示出宽阔的学术视野，思想极富洞见。

然而，要翻译这么一部学术奇书对于译者来说无疑充满挑战，极为困难。书中涉及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天文学、社会学甚至服饰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论及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数以千计，采纳的文献资料语种涉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译者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翻译过程中本书的责任编辑许进兴老师对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感染了本书的译者，我们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上海外语出版社学术部的孙静老师，她为本书翻译的学术规范性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本书的序言、导论由王松林（宁波大学）翻译，第一章由徐燕（宁波大学）翻译，第二、三章由张陟（宁波大学）翻译，第四章由葛春萍（湖州师院）翻译，全书译文最终由王松林统校。译者深知自己学力不济，英文水平不高，虽尽其所能力图将原著的思想风貌展现给读者，翻译中不少疑惑之处也曾面向原著作者讨教，但终因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一定尚存不少谬误，敬请读者匡正。

王松林

于宁波大学宁大花园

2012年11月30日

当我们说某些人“应该枪毙”或“从地面上”消灭时，我们知道，通常这些话在人们看来意味的并非是字面意义。这只是一种修辞格，社会对这一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其内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一表达为自己裹上了一层以虚构为防护的外层，尽管这一防护层有时不起作用。人们也创造出构思丰满的虚构的作品（如神话、故事、历史等），它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可能不再被认为是虚构的东西，可能言必为真或被信以为真。这些故事中的受害者可能是整个民族或某些群体，甚至是整个人类，犹如上帝所言，他会“将我创造的人类从地面上毁灭”。上帝所为之于人类，也促使人类所为之于他人。有时，这一区别并不清晰，因为就人类而言，种族憎恨和厌恶人类之区别也不总是太清晰，况且人们总是会借用上帝的表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上帝的这句话回荡在整个《圣经》和人类历史中。这句话曾被用来指以色列人及他们的敌人，还有被征服的野蛮人、爱尔兰人、穷人、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等。其形式多样，或带有灭绝人寰的意图，或带有讽刺性的威胁，或是虚构的幻想以及虽然无关性命却多少有些令人气恼的口头禅。人们说这句话，可以是“说着当真”，也可以是“说说而已”，还可以是“不只是说说”。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一表述对人所构成的侵犯范围，即这样的修辞格及其行为实施之间的这一过程。时间跨度从创世记到现今，但主要讨论对美洲的征服及至二战结束这一时期。本书细察了众多作者，考察了众多声音，主要集中在讨论蒙田和斯威夫特，但也讨论了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①，让·莱里^②，奥斯卡·王尔德和乔治·萧伯纳，以及自哥伦布、韦斯普奇^③到布干维尔^④、库克^⑤的诸多旅行作家和人种志史家。万象背后可见“创世记”之大灾难，大洪

①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c.1484—1566)：西班牙历史学家，著有《西印度毁灭述略》，记录了欧洲殖民者对土著人的暴行。

② 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 1536—1613)：法国探险家，著有《巴西航行记》，记录了作者前往巴西的航海经历及抵达巴西后与土著人的交往及其传播新教的过程。

③ 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据传他早于哥伦布远航至南美，有人认为美洲(America)就是按照他的名字命名的。

④ 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 1729—1811)：法国航海家，曾率有科学家参加的大海船从法国布勒斯特港出发做环球航行，到过塔希提岛和新几内亚，著有《环球旅行》，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

⑤ 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英国探险家、航海家，曾详细绘制航海图，记录他的太平洋航行，是欧洲最早接触并记录新西兰、澳大利亚东海岸、夏威夷群岛等地的人。

水、平原城邦之大毁灭，其恐怖、荒谬之极总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密切相连，二战期间更是登峰造极。

广义而言，本书讨论的是欧洲人想象中如何对付他们习惯上谈论的要杀戮的群体，然而他们却未能完全灭绝这些群体，因为这一任务过于艰难或过于令人厌恶，或许他们需要那些受害者来充当劳力，要不就是有对抗性的情绪中途遏制了这一杀戮行径。本书探讨的是野蛮人这一“他者”概念在人们想象中引起的共鸣，但野蛮人并非是个简单的高贵或低贱之概念，而是作为参照之人物，通过他我们在痛苦的自我定义中面对自我，而这一自我定义又过于复杂也过于矛盾，经不起惯常意义上的还原分类。“野蛮人”令我们心神不宁。他们属于“非我”，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或者“任何语言”，我们鄙视他们，惧怕他们，侵略他们并杀戮他们；我们又同情他们或羡慕他们并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性趣；我们向往他们的天真和活力，他们对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行为和衣着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但其实我们比他们更野蛮；他们相貌酷似我们，这令我们心神不宁，想入非非。他们以双重身份交叉呈现在我们面前：种族上的他者和土生土长的贱民，这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群体——被征服的异教徒和野蛮人、爱尔兰人、巫师、妓女、穷人、犹太人等等。本书拟重新检视我们是如何面对1492年至1945年间“野蛮”这一思想在我们自己以及他者身上的体现。

本书讨论的大部分作家都关注上述问题，他们“为人类自由效力”，但其方式并非总是与当今的公正的道德标准一致。他们反对压迫，但却拥有压迫的欲念，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欲念。蒙田和斯威夫特皆有雄辩之才，反对殖民掠夺和屠杀，若活到二战他们定当对纳粹恨之人骨。但是，两人都曾认真地思考过大规模杀戮这一念头，他们那种乐意接受大屠杀并对之无动于衷的心态叫人不安；萧伯纳也曾赤裸裸地称有必要根除社会不需要的群体。斯威夫特的两篇伟大讽刺作品涉及的就是种族灭绝：《一个温和的建议》和《格列佛游记》中慧骃计划将类人动物“从地面上”根除的计划指向的是受害者而非压迫者。后一个计划未能付诸行动，但却经过深思熟虑，且在细节上令人不安地酷似纳粹的实际暴行。本书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譬如，我们何以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斯威夫特区别对待，且必须区别对待——一方面要解除斯威夫特背负的替大屠杀辩护的罪名；另一方面斯威夫特又无时无刻都赞同（至少没有否决）慧骃国的屠杀计划。

这是一部关于西方想象和西方观念的书，并不讨论被征服的土著人的观念，即便有也是西方人眼中的土著人观念。出于需要，本书使用了诸如“野蛮人”、“土著人”、“印第安人”、“黑鬼”之类的字眼用于讨论文中涉及的时代背景，也旨在反映那些时代欧洲人的心态。

致谢

本书第一章的内容曾分别发表在《伦敦书评》(1992年8月, 10—12)、《现代语言季刊》(1992年第53期, 299—363)以及(部分内容)《18世纪的生活》(1994年第18期, 168—97)。第三章的部分内容(约三分之一)源自“贝特森讲座”, 后来收录在《评论集》(1999年第49期, 101—31)。本人要感谢《伦敦书评》及其编辑玛丽-凯伊·威尔默, 感谢编辑马歇尔·布朗、罗伯特·马库宾、斯蒂芬·华尔以及其他期刊的出版商(杜克大学出版社,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及牛津大学出版社)。

书中的其他内容未曾公开发表过, 尽管部分内容起初是作为论文在不同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宣读。我对那些在不同场合帮助过我或参与讨论的人感激不尽, 在此难于一一具名致谢。然而, 我要特别感谢弗兰克·莱斯特林楠特。1992年他与我一起在位于法国图尔市的文艺复兴高级研究中心编写了《16—17世纪法美研究》, 也正是在那里我才开始真正地涉猎蒙田并向一群比我更了解蒙田的听众发表了一通演讲; 感谢乔纳森·兰姆和伊恩·希金斯, 两位分别是位于奥克兰(1993)和堪培拉(1996)的戴维·尼柯尔·史密斯研讨班的主任, 他们鼓励我以南太平洋旅行叙事为背景来研究《格列佛游记》; 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伊恩·麦克卡曼, 1996年作为该中心的研究员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专门研究这一课题; 感谢保罗-加布里埃尔·布鲁斯、苏西·哈里弥和塞治·索佩尔, 他们在巴黎的几次学术报告触发了本书的研究兴趣; 感谢布瑞恩·哈蒙德和安东尼·斯特拉格尼尔, 两位均先后担任英国18世纪研究会会长, 他们邀请我做了1998年的年会报告, 本书第4章即是这一报告开篇的主要内容; 感谢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院长吉斯·托马斯阁下, 他邀请我做了1999年度的“贝特森讲座”, 这为本书第三章的主要观点奠定了前期基础; 非常感谢耶鲁大学、国家人文基金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给予的学术休假和研究基金资助。我也非常感激许多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帮助, 尤其是耶鲁大学图书馆(包括耶鲁大学英国艺术研究中心图书馆和路易斯·沃波尔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沃尔伯格研究院和沃里克大学图书馆。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 还有我的家人, 都在许多具体的事情上给予我指导并提供信息, 历时多年, 有时他们还慷慨花时间进行研究, 或通读或部分阅读本书书稿, 他们是: 罗薇娜·阿多诺、耶胡达·鲍尔、迈克尔·贝尔、沃尔克·贝格哈恩、琳达·布瑞、吉姆·卡尔森、金伯利·克里斯曼、丽莎·克拉吉西、戈登·克雷格、戴维·戴彼得宾、凯伦·道尔顿、劳伦斯·J·戴维斯、迪安·迪卢那、布朗文·道格拉斯、帕斯卡·迪皮伊、安德鲁·埃德蒙、

菲利斯·吉布森、约翰·吉尔莫、安东尼·格里菲斯、文森特·吉洛德、简·戈拉克、罗伯特·格兰特、哈里特·哈里斯、G.J.休曼、乔治·亨特、希拉·亨特、弗兰克·柯莫德、乔治斯·拉莫尼、特劳戈特·劳勒、弗兰克·莱斯特林楠特、罗伯特·马赫尼、蒂娜·马赫尼、伊丽莎白·马拉尔德、唐纳德·梅尔、琳达·麦里恩斯、詹尼·麦兹西蒙斯、安德里亚斯·米尔克、洛里·米舒拉、莎莉·穆尼、杰西卡·曼斯、马克斯·诺瓦克、罗纳德·鲍尔森、玛乔里·帕洛夫、玛西亚·普安顿、朱迪·罗森、弗兰索瓦·里戈洛、克里斯塔·萨蒙斯、杰弗里·萨蒙斯、纳内特·斯特尔、琼·舒斯勒、玛丽安·托马勒恩、苏珊·沃格尔、珍妮特·惠特利。这一长串名单远没有详尽列出所有我要感谢的人，仅仅罗列名单并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最后，但绝非是最不重要的，我要特别感谢凯茜·豪汀。她在本书定稿的过程中，克服诸多困难，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